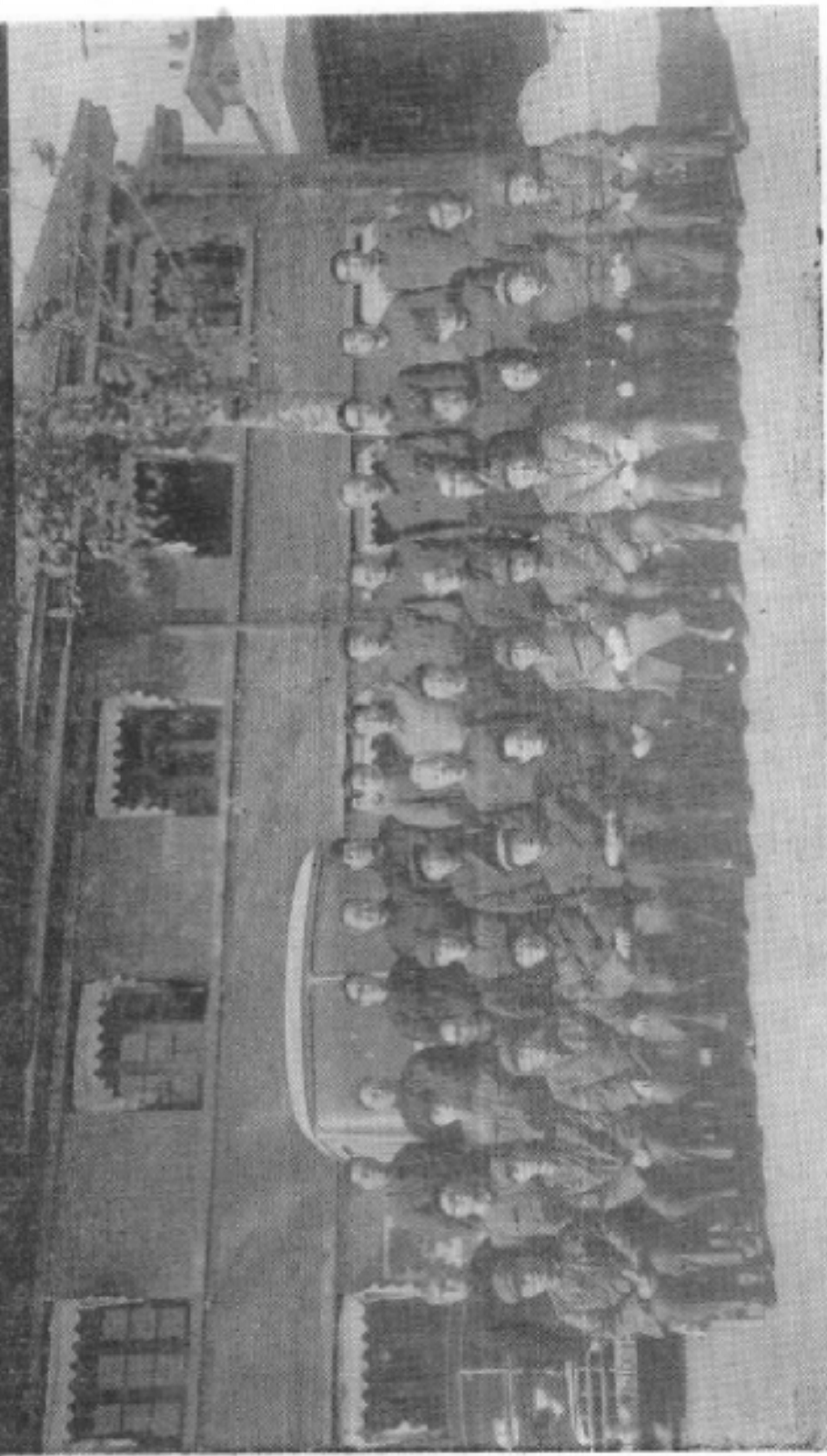


巩县地方史志北京座谈会合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于民政部



(自左至右) 前排：沈向之 曲克济 王桂五 张柯岗 王国权 王成恩 陈雷 范志 许德厚 赵勤敏 王正中 王金顺
 中排：张普周 崔济民 马怀棠 田薇 孟庆祐 张虚 任知恕 郝福田 张馨玉 杨琦 卢耀武 孟凡洋 侯月桂
 后排：雷治普 陈廉煦 路宝杰 刘平成 白广德 蔡瑞卿 李永兴 张三慧 孙宪周 任如时 魏明甫 胡兴业 李国寿

目 录

封面题字	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县志编委总编辑室主任	张普周
巩县地方史志北京座谈会留影		
巩县地方史志北京座谈会签名留念		
巩县地方史志北京座谈会纪要	陈赓煦	(1)
访问王国权同志	巩县志总编室	(9)
我参加革命的回忆	崔济民	(15)
五十五师“五·一五”巩县起义始末	孔从洲	(21)
回忆1944年到1945年皮徐支队进军豫西活动的情况		
.....	史向生	(28)
嵩山区专员公署活动情况(1944—1945)	范 惠	(42)
1944年至1945年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武装斗争简况		
.....	许德厚	(54)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师军史(摘抄)		(56)
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第三团琉璃庙沟反袭击战斗		(62)
难忘的巩县——回忆老三团在巩县的后方基地建设		
.....	卢曙天	(64)
转战豫西	沈甸之	(69)
怀旧——重访巩县有感	沈甸之	(93)
王桂五同志谈党史资料		(94)
巩县抗日第二区政府主要活动情况	赵 敏	(97)

皮定钧简历（1914—1976）	（102）
徐子荣简历（1907—1968）	（102）
巩县抗日第四区政府的工作	康苇军（103）
武剑西简历	（106）
先父王公抟沙传略	王正中（108）
深明大义的爱国老人	张 虚（111）
记张荫南老先生勉励儿女抗日的故事	
悼念徐子荣同志	王桂五（112）
在京老工人兰庭蔚回忆片断	（113）
参加巩县地方史志北京座谈会有感	孟凡泽（115）
悼念皮定钧将军	王桂五（116）

本期责任编辑

孙宪周 任知时

本期责任校对

张进保

巩县地方史志北京座谈会纪要

陈赓煦

1983年11月11日上午，在北京东安门大街民政部小会议室召开了巩县地方史志北京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是在原民政部副部长、顾问王国权同志倡议和赞助下，由中共巩县县委和县政府委托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县志编委副主任王成恩同志和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县志编委总编辑室主任张普周同志主持召开的。

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二十六位同志（名单另附）。

县里出席会议的还有县文化局副局长孙宪周，县档案馆副馆长刘年戌，县政协常委任知时。县志总编室副总编陈赓煦，及总编室人员侯月桂、李同库，党史办公室胡兴业、路宏杰，教育志编辑组雷浩哲、魏明甫等也都出席了会议。

上午九时会议开始，宾主双方先一一做了介绍。王国权同志满面春风首先讲话，他饶有风趣地讲到：他原姓康，今天，大家齐集一堂开个“老乡会”——主要是县里同志要开地方史志座谈会。接着，他概略地谈了他从1933年离开家乡后的简单经历。在谈到这次座谈会的必要性时，他说：“我们是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人民养大的。巩县同志，巩县县委希望同志们写点有关巩县的历史、革命史，我们应该尽我们的义务。”他还谦虚地说：“我写巩县历史，不了解情况，发言权不大。象当过县长的王桂五同志，区长、区委同志有发言权。我只能将巩县解放前，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会历史背景贡献点情况。”

当他谈到巩县原来是个穷县，现在工矿副业发展很快，比从前富了些时，语重心长地希望巩县同志不要满足现状，要搞科学化、现代化，努力提高生产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和世界各国比，比发达的国家，我们还相差很远。他在临结束谈话时表示态度说：

“巩县是我们的家乡，现在巩县写地方史志，搞建设，我也常想要尽自己微薄之力为家乡做点好事，做些贡献；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是要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建设新巩县，现代化的巩县，要靠巩县全体人民，靠巩县县委，巩县党政军。我们在外边只能从另方面尽点乡土之谊。”他谈话时亲切诚恳，古今中外，旁证博引，谈笑风生，不时引得在坐同志的欢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嗣后，王成恩同志讲话。他谈到县里来北京开座谈会的意义和任务。他首先代表巩县县委、县政府向到会老首长、老前辈、作家、教授、工程师问好；对应邀到会的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谈到受委托来北京开座谈会，有三项任务：一是向在京老前辈，老首长表示看望问候；二是汇报巩县的简要情况；三是征集编写巩县地方史志的资料。

在汇报巩县情况时，他说，粉碎“四人帮”，特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巩县工农业有很大发展，农业商品经济发展很快。今年天帮忙、人努力、政策好，农业上取得了历史上少有的好收成。预计工农业总产值在1982年三亿八千万的基础上，1983年可达五亿三千万元。（后来实际达到5.7亿）

他还谈到，党中央对巩县工作很重视，胡耀邦总书记两次对巩

县工作做了指示。七月十七日，耀邦同志从北京亲到巩县视察，听取县委工作汇报；并就领导班子知识化，发动群众集资办矿，引进先进技术，工农业翻番和将巩县建成非常优美的地方诸方面作了指示。要求巩县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十亿以上，将来到党的十三大发言。现在正落实总书记的指示，聘请专家、高级工程师，制订1983——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1978年工农业产值二亿七千万为基数，1988年达到十一亿，十年翻两番。那时巩县人口控制在六十五万，人平年产值1680元，农民收入人平670元，年递增19.1%。

会上，他分析了发挥巩县优势的可能性，也清醒地认识完成这些指标的艰巨性。他谈到，县里需要招贤纳士，向全国招聘科技人员、专家、工程师。希望在坐的老首长、老同志、专家、工程师，方便的时候回巩县看看，帮助指导县里工作，早日将巩县建成一个非常富裕、非常优美的地方。

谈到地方史志的编写工作，概略地讲了前段工作进程。他特别提出，编写社会主义新史志，首要的是占有充分资料。建国以来工作大部有档案，民主革命时期或再远一点的材料，搜集着已很困难；原有一点材料，“文化革命”也散失不少。所以许多历史材料多保存在老同志和知情人的头脑里，就时间的迫切性讲带有抢救的性质。在坐的同志，都曾生活、工作、战斗在巩县一个时期，希望您们能将自己耳闻目睹、亲身经历有关巩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风土人物等各方面提供些材料，工作之余写点回忆。会后，县里同志要登门采访，必要时邀约有关同志开专题小座谈会，请同志们多帮助、指导我们的工作。

他的发言，到会同志十分关注，极感兴趣。有的同志将讲话要点摘记下来；有的频频点头报以亲切微笑；有的不时插问、补充。会场上春意盎然、热气腾腾，情绪非常活跃。

早年任过巩县地下党县委书记和抗日民主县政府县长的王桂五同志讲话时，引用伟大诗人杜甫《月夜忆舍弟》中名句：“霜(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表示对故乡、同乡、同志的怀念。接着他就编写地方史志的重要意义和地方史志要古为今用，为工农业翻身服务提了很好的意见；并表示态度说，做巩县土生土长的人，巩县县委需要什么材料将尽力而为。

会上他回忆了1938年地下党活动和1945年县政府组织建设情况。他提到写历史要注意准确，核对事实，有差错要更正，遗漏的地方要加以补充；由于时隔四十多年，哪一个人都不一定记得完全对。

他谈到抗日县政府重大政治运动主要是“倒地”运动。群众发动的规模相当于后来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倒地的大概情况分三种：一是巩固区，如一、二、四区，基本上都倒了；二是游击区（双方“拉锯”的地区），一部分也倒了；三是敌占区，没有倒。

关于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皮徐支队）在巩县活动情况由到会的原作战部许德厚和沈甸之同志讲了话。许德厚同志介绍了皮（定钧）徐（子荣）支队进入豫西的背景；谈了进入巩县两次战役：1944年11月打黑石关和1945年6月琉璃庙沟战斗；谈了三十五团、老三团、县独立团领导成员和张之朴同志的嵩山游击队（嵩山义勇军）情况。沈甸之同志着重谈了1944年在登封过了中秋节，最早率一连人进入巩县、汜水、荥阳、密县宣传群众、扩大影响，了解各县情况，

寻找地下党关系的经过。此外，他还满怀激情谈了他最近到禹县、密县、登封、巩县、新郑五县访问老战友、老房东、瞻仰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馆的感想。他以遇到的几件实例，谈到有个别县对老同志、复退残废军人优抚安置工作不好，甚至有的基层干部歧视、刁难、迫害革命老同志。对此他感到极大义愤。他在会上义正辞严的一席话，唤起到会同志强烈共鸣。

前豫西专员公署专员范惠同志谈了豫西根据地由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和专署组织建设活动情况。

赵勋敏同志操着太行山区乡音，深情地谈到自己虽不是巩县人，对巩县很有感情。她说巩县群众真好，印象很深，在报上见到巩县的发展变化，心里很高兴。这次县里谈的情况都记到本本上。她谈到在巩县任二区区委书记兼区干队政委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时，仿佛沉浸在叱咤风云、火红青春的年代。她讲道，当时二区主要斗争对象是益家窝伪警备队陈宪章；她曾和区干队长孙廷瑞抓了陈宪章小老婆；谈到率领民兵自卫、支前、倒地、斗争日伪汉奸、地主恶霸的情况；还谈到我军撤离巩县后，敌人疯狂报复，位公茂反攻倒算杀害我村乡干部、群众的历史。最后她诚恳表示有机会要回巩县一次，看看战斗过的地方和情同骨肉的二区群众。

青年时期参加地下党从事兵运和工运活动的老同志崔济民，在会上重点谈了在1933年到孝义兵工厂接关系、恢复重建党组织活动的经历。

陈雷同志和作家张柯岗谈话时都抒发了对故乡的情思。他们感到参加这次座谈会，心里很高兴。本着对家乡应尽义务的精神，能做的事要尽量帮忙；如果有机会，也要回老家看看。

当会议主持人请教授、工程师讲话时，中国科学院任知恕同志，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张三慧、轻工部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孟凡泽，谈了对故乡怀恋之情。他们说，听了县里发展变化和前景规划很受鼓舞，一致表示：要步革命老前辈、老同志后尘，为建设家乡做些贡献，特别在发展教育事业和培养人才方面尽自己的力量。他们建议，县里发展教育应有个规划，要肯下本钱，文化发达了才能实现四化。县里可先办些中等专业学校，将来办大专和大学。任知恕同志还提到巩县是古文化发祥地，有东周故城、汉代冶铁遗址，伟大诗人杜甫故里、宋陵、石窟寺、近代革命根据地。这对教育后代有重大作用。要把巩县建成开放县，可供旅游的好地方。（说到这里，县里同志答道：巩县已是对外开放县。最近老庙山发现一个大溶洞，正在建设。里边钟乳石、雪花石千姿百态，景象奇特，不久将可供各界人士参观游览。）

会议紧张进行了三、四小时。本来还有同志发言，因时间关系，时已错午，有些可以会后单独采访交谈。最后王成恩同志讲了简短的结束语。在热烈的掌声里，座谈会胜利结束。

会间休息时，与会同志摄影留念：十三时许，在民政部餐厅共进午餐后，同志们相互致意，挥手告别。

座谈会原来还邀请有孔从洲、史向生、晏明鳌、卢曙天、王思合、叶继尧、张皓若、康苇军等同志。他们有因公出差，有正参加重要会议，有因健康关系未能到会；但接到邀请信后都讲明情况，有的会后热情主动地提供许多宝贵资料。

北京座谈会由于准备充分，组织周密，目的明确，是一次圆满成功。会场情绪始终如一：热烈愉快，生动活泼。赴会的同

志、战友、同学、乡亲、故交相晤，谈今叙旧，格外亲热。这次会议既增进同志间友谊与团结，又沟通巩县人民与在外亲人的密切关系；会上提供的历史资料和重要线索，为编史修志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志们在会上明朗表态支持巩县各方面建设，也将大大鼓舞巩县人民战胜困难加速翻番规划的实现。

巩县地方史志北京座谈会参加人员名单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王国权	民政部顾问、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	康店
陈雷	人民解放军总后副总参谋长	康店
王桂五	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主任	北侯
张柯岗	作家	张岭
曲竞济	北京军区副政委	礼泉
王金须	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政委	草店
范惠	原总后副部长(已离休)	开封市
沈甸之	原空军学院训练部顾问	郾城
郝福田	农牧渔业部老干部局局长	
赵勋敏	轻工业部日用化工局局长	山西
任知恕	科学院教育局局长	孝南
崔济民	农牧渔业部土地利用管理局局长	山头
芦耀武	文化部对外司司长	常庄
马根荣	核工业部二院党委宣传部部长	神北
许德厚	工程兵司令部副总参谋长	孟津
杨琦	许德厚同志的爱人	
王正中	外文局翻译	北窑湾
孟凡泽	轻工业部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西黑石关
张三慧	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白窑
张黎至	北京晚报社编辑	干沟

孟庆祜	北京重型机械厂技术员	西黑石关
张 虚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科长	张岭
白广德	民政部办公厅秘书处	古桥
蔡瑞卿	人大常委办公厅	蔡沟
李永兴	民族文化宫俱乐部	堤东
田 薇	离休干部、原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副教育长(马再尧同志的爱人)	
王成恩	中共巩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普周	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孙宪周	巩县文化局副局长	
任知时	巩县政协常委	
刘年戌	巩县档案馆副馆长	
陈赓煦	巩县志总编辑室副总编辑	
胡兴业	中共巩县县委党校秘书	
路宏杰	中共巩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李同庄	巩县志总编辑室	
侯月桂	巩县志总编辑室	
雷浩哲	巩县教育局教育志编辑组	
魏明甫	巩县教育局教育志编辑组	

访问王国权同志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份，县志总编室几个同志访问了王国权同志，请他写革命回忆录。国权同志很谦逊，说没有啥可写，都是干些应该做的事情。交谈中，我们梗概地了解他革命的一生，兹介绍如下：

王国权同志，原姓康，名午生，字厚庵。一九一一年底，出生在河南巩县康店村的一个富农家庭（后来破产了，土改时划为贫农）。他的童年和青年是在北洋军阀逐鹿中原、新军阀混战中原，河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渡过的。

国权同志年轻时，村里人组织了自卫性质的红枪会，请师傅，练武功，烧香拜神。练武功名叫“硬肚”，说是练好了，可以刀枪不入。当时，他父亲叫他参加，他见到有烧香拜神之事，就没有加入，但实际是同村里人站在一起的。

当国权同志该上初中时，他的家庭已破产到中农程度。由于其父亲想发财，就在东山上开了个小煤矿。在那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一个富农怎么能争得过那些大地主呢？结果煤矿赔钱，破产。家里也就贫了。家庭不同意他到开封上中学（本县尚无初中），想叫他到孝义兵工厂当学徒工，不管食宿，每月可得工资八块大洋。国权同志上进心强，坚决要求到开封上中学，父亲只好勉强同意他上了中学。考大学预科时，因家庭贫，考上学也上不起，国权同志本无心报考，是冒然应试，结果却考了理科第三名。这样，极大的鼓舞了他的学习情绪。因此，想方设法上了大学。在谈到这些时，他很有感触地说：“大学预科，本科一年，都是勉强混过来的。那是家里不寄钱，没钱交学费，更没钱买书，吃饭也交不了饭钱，欠了一堆账。我是一直忘不掉一些老朋友的支持和帮助的。特别是一个姓杜的炊事员，我在开封黎明中学读书时，他就给我们做饭；以后，我考入河南大学，他又随我们到河大办伙食。包伙；当我离开河大去日本时，欠他不少饭钱，我讲明一时没钱，他却很慷慨地说：‘你走吧！将来有钱时再还，没有钱也就算了。’他是河南滑县人，解放后曾托人找他几次未找到，内心一直感到很不安。”

“九一八”前后，出于爱国主义思想，国权同志看到国家民族危机，心情沉重，同时个人也无出路，在革命思想影响和生活逼迫之下，曾考虑过上山参加土匪武装（当时河南所谓土匪武装很多，有什么樊老二、蔡老八等，实际上有农民起义性质）或组织民团，进行武装斗争。这些想法，曾得到河大中文系的讲师张晨曦先生的同情和支持。

国权同志开始比较有意识的进行政治活动和组织团体是在“九一八”前后与同学彭寿松、宋一涵等人一起，在王毅斋先生支持下，在开封组织了西北研究会，研究对象是西北的冯玉祥先生。据说冯玉祥是同苏联有关系的。王先生是个德国留学生，经济学博士，当时在河南大学任经济学教授，是个正直人，热心政治，曾在刘镇华部下做过一任

县长，遇事敢说话，外号叫“王大炮”。西北研究会成立不久，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王毅斋先生挺身而出，在河大每周一次的纪念大会上公开发表抗日讲演，号召组织抗日义勇军开赴东北前线参加抗日。王先生演讲后次日即被捕（当时河南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是刘峙，此人极为反动），后被营救出狱。王先生在解放后曾任河南省政府副省长，在文革中被整死了。王国权同志是一九三二年春参加开封左联组织，因同王毅斋先生的关系密切，刘峙又亲自到河大讲话，要同学们“读书救国”，不准搞什么组织活动。同时捕了不少进步学生，并派人到学校监视进步学生活动。为避免国民党迫害，于一九三二年夏借暑假之机到了北平。在北平同左联发生关系，参加了他们的一些活动，由张玉琴（河南汲县人，已于两年前病故）介绍的。张是当时北平左联青年部长。当时也曾和一些同志酝酿过从秦皇岛坐船到苏联去，但未达目的。

一九三二年秋，他在北平，住在沙滩一个好友姓买的房子里。是个回族人，很耿直，讲义气，一切生活费用均由他负担。国权同志考虑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只得重返开封。回开封的路费也是买同志将他父亲刚给他买的一件大衣送到当铺换的十几元钱。回到开封以后，河南省立师范学生张新铭就来找他，同开封左联组织又接上了联系，同师范学生梁雷、王宗之这批革命同志来往。同时又同谢中锋同志认识（现在交通部，已离休）。当时他们有的已入党，有的是左联成员或反帝大同盟成员。在这个时期，又结识了赵一萍同志。赵抗日战争中牺牲在山东。

同年秋末，因无钱继续上大学，经河大同学介绍去河南泌阳县立师范学校教书。因当时泌阳县教育局长是国权同志河大毕业的同学，县立师范当时恰好无校长，就要代理校长几个月。这个学校原来革命影响是比较大的，有一批学生曾在党的领导下闹过豫北暴动，在太行山南麓建立起来过短时期的豫北革命根据地。后来失败了，据说领导人郭大斧被捕后叛变了。国权同志到任后又约了几个进步教员去教书，对那里的青年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由于遭到该县国民党县党部的反对，在那里工作了半年就辞职了。

一九三三年夏，江绍文（现名江闻道）同志到河大任教（现住上海，已八十四岁高龄），他到任后不久，国权同志即同他认识，并且关系密切，他是开封地下党的负责人，也是反帝大同盟的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在王毅斋、稽文甫两先生的支持下，他们曾在开封组织《今日社》，在书店街创办大陆书店，出版《今日杂志》、《大陆文艺》。《大陆文艺》当时是由姚雪垠主编。书店存在一年多时间，刊物大约出版两期，即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具体负责书店的郭伯荣、邢肃天等同志被捕，在西北中学教书的宋一涵同志也被捕，国权同志和雪垠同志闻讯，于当晚即转移住处，天未亮就离开开封回到家乡——巩县。

一九三二年前后，在创办大陆书店、出版《今日杂志》的同时，他曾帮助王毅斋先生创办私立杞县大同中学，大同小学，介绍了进步同志去大同中学任课，有梁雷、傅孤侣（已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王鸿儒、赵一萍同志，还有周希亚、郭晓棠同志等，都是到大同中学教书的。周希亚是北平“左联”组织介绍，说是到河南帮助我们开展左联工作的，是共产党员。后来，大同中学对河南，特别是对豫东一带革命活动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培养了不少革命青年。现在的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就是那个学校第一期学生。（大

同中学现在还存在，中间因反动派的压力曾改过名。去年又经河南党政机关批准正式恢复了大同中学的名称。)

大陆书店被查封，刊物被查禁，一些同志被捕，国权同志同雪垠同志一起在家乡住了两个月，大约是一九三四年的夏秋之际，一同从巩县又回到开封。当时在开封已不好立脚，一些同志建议让他们离开河南。这时王阑西同志正好从日本来信，希望他到东京去。就这样在进步教授王毅斋、嵇文甫、江绍文、张仲鲁(当时是南京中央大学秘书长)诸位先生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才离开河南经上海东渡日本。雪垠同志去了北平。

到东京后，开始正式学习过四个月的日文，曾在日本大学交过一两次学费，但实际上没上课。在东京这个时期，因生活困难曾给一个留学日本的同乡河南巩县女子高小校长当日文教师，教了几个月，每月给我拾个日元，以维持生活。

在东京，国权同志，主要是在中国留学生中从事左翼革命活动。当时左翼领导人是任白戈同志，他同上海左联或社联有组织关系。左翼文化活动，开始有社会科学研究会，是秘密的，或半秘密的，参加者有程明生、王兰西、雷任民、杨彰武、毛掬(女)等等。曾在东京华侨饭店里开过会，为了便于公开活动，后来把社会科学研究会改名为世界名著编译社，成员有几十人。郭沫若同志当时也在东京，他们有要事常常去请教他，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工作。郭老有时也参加他们的会议，并讲过话，因日本特务对他监视很严，所以郭老参加他们的活动是很谨慎的，常常是声东击西，拐弯抹角迂回行动。

世界名著编译社，由谢树椿同志负主要责任(原北京师大学生，后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生)，国权同志任宣传部长，王孔照任组织部长，三人负责。这个组织在当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影响是不小的。本来要准备出版杂志和翻译世界名著，但未来得及，国权同志就回国了。因那时，即一九三五年，由王乃天同志介绍他在东京参加了联共，他的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严密监视。他回忆说：“一天早晨，我身上带了一张传单，从高元寺出发准备到早稻田去设法印传单，未料到在车站进口处，被日本警察突然架走，并从我身上搜出了传单，随着就把我送进警察局关进牢房。在牢房关了一整天和半个晚上。先后审问了四次，未问出什么结果。大约是晚上十二点钟左右给我吃了碗饭，然后把我放了，出来后才知我的住处也被搜查。”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权同志不好在东京继续呆下去了，经王乃天同志介绍，于一九三六年冬天回到北平，参加了北平民先组织及其活动。

一九三六年底，王乃天同志也回到北平，同北平党组织商量要国权同志到宋哲元部队做兵运工作。国权同志要求学习军事，经党组织同意，于一九三七年春由北平组织介绍到延安抗大学习。为了保密，改名为王国权，沿用至今。

他先在抗大军事队学了两个月，后又转到四大队九队。九队是个老同志较多的队，董老是政治委员，聂鹤亭同志是队长。毛主席曾给他们上课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张国焘讲政治经济学，赵维汉同志讲统一战线，张闻天同志讲党的建设。可惜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平型关战斗打响，国权同志奉命同另外两个同志(姓陈，据说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从延安出发到晋察地区参加抗日。

路过太原时，周总理已在太原，从太原到阜平，沿途见到我们的军队向华北地区进发；而阎锡山部队狼狈后撤，留下了不少弹药仓库被我军接收。这时日军已占领平津，正向保定、石家庄方向前进。大约一九三七年九月前后国权同志到阜平县。那时聂老总刚到阜平，王平、李葆华同志等也到了阜平，河北省委刚在阜平建立机关。分配国权、邓华、张苏等同志一起到晋察冀一分区开辟工作。当时杨成武同志已在平型关战斗结束后带部队在察哈尔蔚县休整。当国权同志等在一个傍晚到达蔚县城，同杨成武同志会见时，蔚县东面河营一带发现敌情，在蔚县吃了一顿晚餐，即出发向涞源走。一九三七年冬，杨成武同志的司令部转移到涞源。这时，中央命令组织晋察冀地区抗日根据地，杨成武同志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师师长，邓华同志任军分区政治委员，方国华同志任一分区工委书记，国权同志任付书记。张苏同志任专员不几天，要组织晋察冀地区政府，宋绍文任主任委员。张苏调边区工作，十二月底，国权同志任一分区地委书记，王斐然同志任专员。国权那时穿长袍，王震同志叫他王先生。王震同志骑一匹棕色马，留个大胡子，群众叫他王大胡子。据国权同志回忆：一九三八年初，以地委书记身份带着准备到灵邱县任县委书记的包克同志，两个人拉了一头小毛驴，从涞源县到灵邱县，一直走了一天，当晚十点左右到达灵邱县城。城门紧闭，叫了半天，城楼上出来一个放哨，的就是当时在那里任县长的侯国梁同志，可见当时环境的艰苦。直到一九四三年，到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整风学习为止。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参加了许多重大战役，如黄岭战役、涞源战役、（百团大战中）狼牙山战斗和多次反扫荡战役以及王震同志在一分区指挥的涞源北四十峪战役等。在黄土岭战役中打死了日军阿部中将，是在空降时被我军对空射击时打死的。我方在这次战斗中，损失也是很大的。特别是一九四一年反扫荡战役，地方干部以及广大根据地人民被拖得疲劳不堪，疟疾流行，病号极多。战役一直进行了几个月，许多同志都在战役中病倒或牺牲了。国权同志虽也病了，但那时年轻，一直坚持随军活动。群众除遭日本鬼子杀害以外，也病倒、病亡的不少。房子几乎被敌人烧光了，群众在山沟里盖起竹棚坚持战斗，没有怨言。那时的军民干群关系胜似鱼水。群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掩护我们的同志。国权同志激动地说道：晋察冀边区有个戎冠秀老大娘，在反扫荡中掩护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把伤兵员放在她家里。他家里很穷，没饭吃，他把伤兵员换上老百姓衣服背到敌占区一个破庙里，他去讨饭给伤员吃，硬是这样把伤员养好重新回到部队。这样的好人好事真是一言难尽，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斗争精神真是可歌可泣的！使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受到深刻的教育。这次战役斗争是残酷的，我们损失比较大，尤为严重的是徐水惨案，县委支队被敌人消灭了，一个县领导机关和县支队逃出来的只有几个人。现在外交战线工作的林中同志，就是这次战斗中幸存的儿人之一。国权同志还说：“这次惨案始终在我脑海中激荡，从来没有忘掉，也永远不会忘掉，正像毛主席说的，不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使我们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确实如此。”这个地区当时的形势和可能出现的情况，他和杨成武同志事先曾作了估计并把这种估计向徐水、满城县、易县、定兴的同志作了传达。由于徐水县领导人对形势估计不足，盲目出击，吃了大亏。

一九四五年日本刚投降，他奉命由晋察冀边区带一批干部到热河。在路上，胡锡

奎、段苏权同志也带了一批干部赶来。到承德后，苏军已到那里。当时除了了解情况，研究如何接收和开辟这个地区工作外，即着手组织热河省委和承德市委领导机构。在承德第一次解放后，国权同志任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长兼承德市委书记。一九四六年夏，由于国民党驻锦州的军队向承德进攻，把热东地区的工作冲垮了。因此省委决定他和丁盛同志带一个旅去恢复热东的局面，国权同志任热东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丁盛任司令员，驻建昌一带打游击，在热东大约工作三年，东北部队打下长春后，即奉命同胡锡奎同志到锦州，组织辽西省委。胡锡奎同志任省委书记，国权同志任省委付书记兼锦州市委书记，恢复开辟山海关到辽西一带的工作，配合关内的战役。胡锡奎同志一直没到任，辽西省委实际上由他在那里负责。在京津解放，我大军南下时，热河第二次解放，中央又调他回热河，省委由李运昌任书记，他任副书记。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运昌调中央任交通部部长，他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后又兼省长。总之，在热河辽西一带前后十年。这个地区在日本鬼子的长期统治之下，人民群众确实苦难深重，不但无饭吃，而且是大姑娘穿不上裤子。十冬腊月一家五六口人穿一条裤子，盖一床被子，破破烂烂，逃荒要饭到处可见。土匪、烟鬼比比皆是，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在第一次解放承德时，我们干部、军队看到人民这种情况，都把自己的衣服和军衣脱下给群众穿。消灭土匪，分发粮食，作了大量群众工作。在国民党军队占领承德后，我们干部、军队又转入农村继续发动群众，消灭三害，进行土改、建党，对敌斗争做了大量工作。热河人民对共产党是有感情的。承德第二次解放后，省委提出改变热河这个落后局面，发展生产，要求作到三年有吃穿。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这一口号最后终于实现了。

一九五五年，热河省建制撤销，国权同志到中央高级党校研究学习班学习一年，毕业后，一九五六年调到外交部工作。学习准备一年，一九五七年七月到民主德国主任大使七年，接着又到波兰任大使，兼任中美会谈中方代表。一九六七年七月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对他的历史、工作进行了审查，批斗，靠边站一年多。一九六九年“五七”指示后，第一批下放劳动，先到黑龙江外交部“五七”干校，地址在长白山大森林边的一个小村庄，在晚上森林里常听到枪声。据说那时，四人帮是怕老干部外跑，后又把“五七”干校搬到湖南茶陵。后被结合为“五七”干校负责人之一，至一九七〇年调回北京，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在这一段工作中，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日尚未建交），曾奉周总理之命，到日本参加著名人士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借机开展中日友好活动，同日本的三木武夫、中曾根、藤山爱一郎、古井喜实、木村一三等相识并结为朋友。当时主要是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和亲自作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国外当大使时，每次回国，周总理、陈老总总是要找他们座谈，问问国外的情况，并一起吃饭，有时毛主席还直接同他们座谈。这一切，使他们在国外工作的同志感到非常亲切，深受感动和教育。在二十多年的外交工作中，国权同志在四个使馆进行正常的外交活动，没出什么乱子，比较有意义的是在波兰的中美大使会谈，对外影响较大。其次是在友协一段，对日本人民外交工作的开展是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的。

在对外友协工作了三年，国权同志是努力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由于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教诲，使“四人帮”非常憎恨，在工作上造成一定障碍。当国权得了支气管扩